

让孩子寻找属于自己的世界观

□谢宗玉



2014年夏初,我家吵得不可开交,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小谢子身上。那时小谢子读初二下学期,考试一败再败,成绩一跌再跌。廖同学坚决要去学校附近租房陪读,一家人都反对,但反对无效。廖同学太强势了,我们拗不过她。

极不情愿地搬过去,然后在周边选培训机构,找家教老师,昂贵的房租和家教费让我犯怵,但小谢子的成绩还是没多大起色。一家人毫无头绪,只能彼此指责。

等闹得大家都疲倦了。有一次,我与廖同学坐在地下车库,心平气和地你一句我一句,憋屈地接受了小谢子中等之资的现实。明灭不定的晦暗灯光,透过车玻璃,笼罩车内两个疲软的身影,像深水区不再挣扎的溺者。我们无可奈何地感叹:成绩也不是万能的,东边不亮西边亮,很多差生都混得风生水起,小谢子以后未必一点好前景都没有。

不关注成绩后,我平时看到什么好文章,若觉得对小谢子会有裨益,不管是否在考试范畴内,都会推荐他读一读,廖同学也不再怕耽搁小谢子功课而加以阻拦。

看完文章,小谢子若是困惑,父子俩还会就某个问题进行讨论。廖同学偶尔也会参与进来。这种讨论随意、热烈、温馨、恣肆,充满了趣味。撇开成绩不提,一家人又回到了从前其乐融融的状态。

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放任自流”的小谢子,成绩居然呈回升之势。看了我的拙文《老谢向左,小谢向右》的读者就知道,中考时小谢子突然大放异彩,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湖南最牛的高中。其中物理和化学都得了满分,这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



更让我们高兴的是,仿佛一瞬间,小谢子就已长大成人,从懵懂童年过渡到了机敏少年,一副破茧化蝶的态势。像一棵冬笋,在厚壤和毛壳的重重包裹下,拔节而出,浑身都透着清新和灵动。

小谢子觉得,应该是那些不起眼的闲聊在暗处发力了。自进初中以来,学业压力突然加重,这时困惑、忧郁、迷惘、倦怠等情绪一齐袭来,他既看不透世界真相和社会本质,又品不出存在价值和生命意义,还找不到命运逻辑和未来方向,所以苦读也就没有半点动力可言。我们越是强迫,他越反感,成绩也就越上不去。而闲聊,让他发现了世界的深度和广度。就像走在一钱天似的昏暗峡谷,走着走着,眼前逐渐出现一马平川的原野,前后左右都能打量得非常清楚。然后自我有了,存在感有了。再然后,有了对生命负责的念想,有了拼却一场为青春的豪情。

如果把未知的事物比作黑暗,那么最初,我们就像点着烛火走在无月无星的旷野。周围除了一点小小的光团外,其余全被无边无际的黑暗给霸占了。我们既看不清来路,也找不到去路。天宽

地阔的人文世界是个什么模样,我们一无所知。而我们能够感知的,就是眼前这小小光团。稍一移动,原先烛照的地方又复归黑暗。我们像一只只被刺瞎眼睛的蜜蜂,在无知的世界里懵懂活着。这时候,叫我们如何去刻苦努力,奋发图强?

我终于意识到了,相对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有比成绩更重要的东西。我要用一种最简洁的方式,让他知道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让他明白人类是怎样一群生物,让他懂得人文社会的构成有几重维度,让他知晓文明是如何运转的……总而言之,我需要有照彻宇宙的光芒来捅破他周遭千重万重的黑暗,让他对自我、对世界、对文明有一个宏观而清晰的把握。而他们的课本,都不是冲着这个目的去的。

接下来的闲聊,我便有意识地引导他往问题的更深远处,透过纷繁的表象,直抵事物的本质。我们的话题既宏大又虚幻,充满了思辨色彩。这些话题与功课学业无关,与经世致用也无关,我只想对他进行最本原的哲学启蒙。我还特意把我们的谈话都录了音,然后认真整理、修改、润色,使每一个话题都能独立成篇。等有空的时候,再拿出来,让他加深理解。两年时间下来,竟有了一本书的规模。

我不再关心小谢子功课的具体进程,但在全国排前五的长郡中学,小谢子的学业成绩居然还不错,到高三,他还“杀”进了理科重点班,这确实让我们吃惊。与惨淡的初中相比,有着天壤之别。这小子变得越来越神奇了,相信在将来的日子里,一定会精彩不断,好戏连台。

现在,这本书出版了,我把它命名为《老爸,我想把世界整明白》。事实上,世界太混乱、太复杂了,世界就是一团解不开的麻纱,世界是整不明白的。我想要的,只是用最短的时间,为小谢子撑开一个看得见的光亮世界,让他能找到自我,找到前行的方向,以及来时的脚印。我们的这些讨论,不管是我的观点,还是小谢子的观点,当然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但在探讨的过程中,小谢子能获得更广阔的视野,对他以往的知识,绝对能起到一个补阙、修正、点悟、连缀、升华的作用。

此书最大的乐趣,不是告诉孩子们什么是正确的思想,而是教会孩子们如何运用正确的思维逻辑,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嗯,2018年高考后,小谢子被全国一所重点大学世界排名第一的遥感专业录取了。

1 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人,还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文学写作者,我都显然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功。我很少能在杂志上发表作品,也从未有一部作品被人们津津乐道,更是从未获得过像样点的文学奖项,所以,我肯定不能算是一个在文学上打开了局面的人。

但是,我有将近40本书出版(具体数字是38本),这又不能不说是一个真实的文学存在。而在这38本书中,除去其中的图像书和人类学民族学著作,大概还有18本比较纯正的文学作品,即小说和散文集。一个人在他56岁年龄的时候,有18部文学作品出版问世,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数字。

2 在这18本书中,有哪一本书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呢?

很多人都问过我类似的问题。我没有答复。与其说是没有答复,不如说是没有答案。人就说,是不是你觉得作品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你无法取舍?我摇头,还是没有答案。

其实我是有答案的。我的答案是,所有的作品都好。

这未免太那什么了吧。狂妄?或者自负?或者自不量力?不,在文学的道路上,我想说的是,我一直在做着一种努力,就是不想重复自己。我珍惜每次写作的机会,努力让每一部作品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面貌和能量。也就是说,在对待写作的态度上,我是很认真的。而既然是很认真地写下来的东西,我又怎么能去轻易臧否和评判其孰优孰劣呢?

3 追溯起来,我写作的历史已经很长了。我在念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给报纸投稿。在大学阶段开始发表文学作品。然后在1991年正式在文学刊物上亮相。我的第一组小说散文被《山花》推荐发表,使我一下子跻身于贵州作家行列,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在我文学写作的第一阶段,即初出茅庐阶段,我写出了像《伤心篱笆》《乡村女子》《月地歌谣》这样的作品,其中《伤心篱笆》刊发在《花溪》后被法国汉学家安妮·居里安翻译成法文介绍到国外。

从1991年到1995年,我连续在《花溪》《山花》《青年文学》《上海文学》《民族文学》《天涯》等刊物发表文学作品,说明我的写作是有一定的实力的。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情,却让我后来的写作偏离了本来的发展轨道。很重要的原因是我1995年改行去做人类学的研究。

4 不过后来我仔细想过,我偏离的其实是须臾也没有分离的。无论命运如何改变,我照样读书写字,照样生活和思考。我只是不再在杂志上发表作品而已。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因此获得了另外一种欢乐和自由。

当朋友们夸赞我的文学才华时,我曾夸下海口说,这不是我真正想写的东西,我想写和正在写的是一部讲述灵魂的书。朋友们从此对我有了新的期待。但是,很遗憾,那本书我一直在写,也一直没有写完。之后时间又过去了十多年,我那本讲述灵魂的书,并没有写出来,以至于朋友们误以为我当年的海口不过是一个玩笑。

我当然没有开玩笑。我那本讲述灵魂的书,就是现在由新星出版社出版的《解梦花》。现在,这本书出版了,就摆在大家的面前。我在这本书里到底讲了些什么?有没有关于灵魂的故事?算不算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个就由大家去评判好了。

5 《解梦花》的确是我写了将近20年的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这本书最早是应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赵南荣先生邀约而写的一部长篇小说。那是1997年,我还在泉州谋生的时候,当时我的《扶贫手记》刚刚出版,责任编辑就是赵南荣先生。那年的初冬季节我们相聚厦门,他对感慨自己做了一辈子编辑,出版了太多的书,但还有一个缺憾,就是没能编辑到一部可以被人们记得住的优秀长篇小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当天晚上我就回家写下了《解梦花》这个书名和第一句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背负着自己的命运走出家门的。”现在这句话被安排在《解梦花》第二章的开头部分。从那时起,我一有空就坐在书桌前写上几句。当时的构思仅仅有一个大概的框架,就是写一个人,始终在做噩梦,在民间遍寻偏方却依旧没能治愈……我实在没想到,一部当初自以为构思相当成熟,可以很快完成的作品,居然一写就是18年,直到2015年才算是基本完稿。而这个时候,当年跟我约稿的赵南荣先生早已经退休了,他虽然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我的写作,支持我的写作,但是,他已经没有能力再来帮助我出版这部书稿了。

6 在学习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我年轻时模仿过很多人,包括沈从文、张承志、何士光、王朔、高行健、加西亚·马尔克斯、石黑一雄,等等。因为受到这些作家作品的强烈影响和激励,我早期的作品的确很难抹去他们的影子和痕迹。但是,到了我写作《塑料》《金花银花》《解梦花》《河畔老屋》《敲窗的鸟》《桃花水红》《山河恋》的时候,我想我已经把受别人影响的痕迹抹得差不多了,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叙述和表达方式。现在,我愿意把我的这些作品看成是致敬大师们的产物。我承认,我依然受他们影响,但我走的是自己的路,说的是祖传的方言。

一个人的文学世界

□潘年英



7 事实上,从刚刚学习写作开始,我就在刻意经营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独特的文学世界。这个世界里的原型人物和故事,全部来自我的故乡盘村。这是一个有点类似于马孔多、约克纳帕塔法县或者高密东北乡、鲁镇、边城那样的地方。在写作的第一个阶段(1984-2000),我写的差不多都是关于盘村的童年记忆,这记忆有哀伤和忧愁,但更多的是一种温馨和甜蜜。代表作就是我的故乡三部曲《木楼人家》《故乡信札》《伤心篱笆》。而在我写作的第二个阶段(2000-2018),我写的则是关于盘村的残酷现实,有些可以称之为“噩梦般的现实”,温馨和甜蜜的内容就少有了,更多的是边缘人群和个体在恶劣现实挤压之下演绎的悲壮与惨烈命运。代表作就是刚刚出版的《解梦花》这五部作品。我曾经想把《解梦花》《河畔老屋》与《桃花水红》作为“新故乡三部曲”先行出版,但后来我改变了主意,我不想落入俗套,我觉得三部曲也好,五部曲也罢,都是人为的称谓,没有必要为某种概念的需要而出版自己的作品,于是,我把这5本书一起交给了出版社。但是,熟悉我作品的人们肯定看到了,这5部作品,的确是“故乡三部曲”故事的发展和延续,是一脉相承的作品。接下来,当然,我还会继续写作“后故乡三部曲”,这是关于盘村未来命运的忧患之作。这样的写作其实早已开始了。

8 从1984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至今,我在文学的道路上已经跋涉了34个年头。这可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啊!很多人在20多岁时就已经功成名就,沈从文在32岁那年也写出了惊世之作《边城》,很多著名作家全部的生命加起来也不到34年。而我苟活至今,依然孤独寂寞,想来偶尔也会觉得心酸。但任何外在的因素都不会影响到我的写作状态。20多年前,我就明白自己将要走的是一条怎样坎坷和艰难的文学之路。

康德说过:“我是孤独的,我是自由的,我是自己的帝王。”此时此刻,我的心情似乎也跟康德一样。

“汪迷”闲话

□朱航满

苏北的散文集《汪曾祺闲话》收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曾答应为这本文集写一篇《闲话的闲话》,不料竟一拖再拖。之所以当初想写篇《闲话的闲话》,乃是这本《汪曾祺闲话》其实与我还是有一点关系的,故而有一些点滴的素材可来作文说说的。记得两年前的一个冬日,我正在单位值班,时值天寒地冻,天又欲雪。苏北说他从安徽来京出差,得闲可约一约,于是我邀约他来一聚。他果然踏雪而来,我略备薄酒,与他在办公室谈文忆旧,好不快乐。那日苏北带来一册书稿,其中以其多年写作的有关汪曾祺的文章为主,并拟取其一篇文章《湖东汪曾祺》为书名,我大致翻了翻内容,建议他将书名改为《汪曾祺闲话》,以为有闲说闲话的散淡之味,没想到他最后竟接受了。那天他还带来刚刚在武汉的《芳草》杂志刊发的一篇文章《汪曾祺的书房及其他》,写汪曾祺在北京的旧居和书房,尤其是详细记录了汪先生的书架上的书籍情况,对于了解汪曾祺的读书趣味非常有价值。我当即表示这篇文章可以收在我主编的随笔年选之中,但后来此文因故未能入选,我作为编者,实在感到遗憾,也觉得有愧于文友。

苏北来访的那天,刚刚去拜访了人民大学文学学院的孙郁先生。他与研究汪曾祺的学者都有联系,孙郁因推荐汪曾祺先生,文章好,有见识,是苏北很尊重的一位学者。得知他们见面的情况,我提及刚刚在陕西的《小说评论》杂志上,读到一篇孙先生的文章《当代文坛的“汪迷”们》,其中有不少笔墨涉及他,并提醒他可看看此文,也算是对他的一种学术上的肯定。苏北得知这个消息,非常高兴,而他的这册《汪曾祺闲话》也便附上了这篇文章。《汪曾祺闲话》还收有苏北的一篇长文《我和汪曾祺先生的交往——日记摘抄》,此文摘抄了苏北与汪先生近10年交往的一些日记片段,由此见证了一段因文学而成为忘年交的情谊,非常独特。那天苏北也为我带来了刚刚整理的这些日记,我翻后很感兴趣,以为对于研究汪曾祺非常有价值。我之所以这样认为,因为在汪曾祺的读者之中,苏北可以算是最为资深的一位,他学汪先生,维护汪先生,热爱汪先生,追随汪先生,也执著地为汪先生编书和写文章,保存了很多十分重要的资料,也揭示了很多他人未曾关注的细节,可以说,其本身就值得我们认真地对待和研究。

除了这册《汪曾祺闲话》之外,苏北还赠过我数册文集,都与汪曾祺相关。诸如他的散文集《书犹如此》《忆读汪曾祺》《那年秋夜》等等。我为《书犹如此》这本集子写过一篇短评,因为苏北在书中提到的一个曾采访过汪曾祺的记者,故而考证了汪曾祺生前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以及见

到最后一位朋友。文章写成后,很得他的青睐。近年来,汪曾祺先生的文学价值被推举起来,苏北的努力也得到了重视,他先后编选了《汪曾祺书画集》《汪曾祺早期逸文》和《我们的汪曾祺》等多册。其中他的那册《我们的汪曾祺》,收录了不少颇有价值的关于汪曾祺的怀念文章。这册《我们的汪曾祺》,原本编成已有数年,在出版社一直搁置,后因适逢汪曾祺先生去世20周年,终于收录在出版社策划的“回望汪曾祺丛书”之中。

苏北与我相识后,还曾介绍我认识了两位“汪迷”。其中一位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龙冬先生,之前龙冬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任职时,曾为汪曾祺出版过一册《逝水》。苏北说他和龙冬的认识极为偶然,但因为老头儿汪曾祺,使他们相识30多年而友情愈密。苏北和龙冬以及其他两位作家还曾一起合作过一册小说集《江南江北》,由汪曾祺先生作序。我和龙冬先生相识后,也是一见如故,他还曾非常关心我的处境,令我非常感动。另一位经由苏北介绍认识的是河南的李建新。在认识建新之前,我刚刚读过由他编选的汪曾祺文集《饮水食豆斋闲笔》和《汪曾祺书信集》。后来又在北京的图书博览会上,购得了由他校订和策划的十卷本《汪曾祺集》。建新从河南来北京后,在位于鲁迅博物馆旁的星汉文章出版公司任职,我们接触更多了,对他的认识也更多了。他对

于汪曾祺的痴迷几乎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对于汪曾祺文章中的一个字一个词都非常敏感,不同版本的微小区别,都被他进行了详细认真校订,是我见过最认真的汪曾祺读者。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汪曾祺全集》,建新作为民间的资深“汪迷”,参与了书信卷和小说卷的编选。

在文学研究中,一般比较重视作家和作品的研究,而对其中的读者研究,往往有所忽略。其实,一个特别的作家,就有一个特别的读者群。2018年的世界读书日,我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书迷》中看到一个细节,就是有位京城颇为资深的书迷,名为鸚鵡史航,在此片中津津乐道他所收藏的一本汪曾祺的签名本,可谓颇具某种象征意味,当时便想到了我的朋友苏北。我不认识这位史航先生,但苏北却是熟悉的,他热情、随性、乐观、宽容,对文学始终怀着一种炽热而真诚的感情,又能暗暗坚守住自己内心的一块领地,这些在今天都是非常难得的。我想,汪曾祺的文学价值之所以日益得以彰显,离不开专业研究者的探究,更离不开很多诸如苏北这样的“汪迷”的拥戴。很多热情的“汪迷”对于汪先生既尊崇,又能够认真地阅读和体味。记得有人称呼苏北为“天下第一汪迷”,时间一长,他自己也就接受了,这其中虽可能会有一些戏谑的意味,但想来也还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